

# 論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

## —— 一致的期望，相互的借鑒，共同的努力

楊叔子 余東升 \*

華中科技大學

### 一、教育——「以人為本」的文化活動

內地大學所開展的「文化素質教育」與香港、澳門、台灣及國外大學所開展的「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在一根本點上的理念相同，思路一致，即均著眼於「教育」自身。

甚麼是「教育」？我們願引用我校涂又光先生的見解。涂先生是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高足。馮先生去世後所遺留的文稿，不論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都是由涂先生親自整理的。涂又光先生不僅在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頗有造詣，而且對教育學也見解精闢。他認為：「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動，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德智體各方面得到發展。」他還特地用英文作了論述，兩相對照，以求明確無誤：“Education-in-itself is a cultural activity, in which man’s body-mind, including knowledge, feeling and will, develops

---

\* 楊叔子，中國科學院院士，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  
余東升，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華中科技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常務副主任，副教授。

intellectually, morally and physically.”這一論點主要講明了教育的定位問題。教育定位在文化領域內，而不是定位在政治領域內，也不是定位在經濟領域內。因為定位在文化領域內，所以只能通過文化活動以培養人才，來為政治服務，來為經濟服務，來為社會服務。離開培育人才這根本點，離開關注、愛護、引導、熏陶、教化、養成，以使人的身心健康發展，進而體現為人的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離開這個「以人為本」的文化活動而奢談其他，只會使教育走入歧途。

教育的根本是「育人」。首先要教會做人，立德樹人，並使人全面發展。所以，教育是「育人」而非「製器」，即教育的對象是「人」，而非「物」。人有豐富情感，有複雜思想，有精神境界，活生生；物無感情，無思想，無境界，死呆呆。

教育所用的方法是「育」而非「製」，是按人成長的規律去「育」，因材施教，而非憑不管實際情況的主觀意願去「製」，按圖辦事。育出的應是有人性、有靈性，而且是有高尚精神的人性與有原創能力的靈性的人才，而非為毫無真正的人味與毫無原創能力的精巧的機器。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教育人，即以文化開發出與發展好那天賦的人性與靈性，教會受教育者既會做人、有德，又會做事、有才。人性與靈性不可分，做人與做事不可分，德與才不可分。問題只是做甚麼樣的人，有甚麼樣的德，做甚麼樣的事，有甚麼樣的才而已。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德與才的關係講得十分精闢：「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才是德的軀體，用以體現德；德是才的靈魂，用以統帥才。嚴格地講，沒有無才之德，也沒有無德之才。人才的層次越高，這一關係就越密切、越清楚、也越重要。才，不僅體現德，而且可以純化德，昇華德；德，不僅統帥才，而且深化才，激活才。司馬光進一步指出：「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止矣；挾才以為惡者，惡無不止矣。」甚麼在「挾」？就是「德」，問題是有甚麼樣的「德」而已。

或許這就是法國莫洛亞（André Maurois）這位著名傳記作家所講的，「無視道德、行為規範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將惡性作為美德」<sup>1</sup>。涂先生講得十分對，「教育自身是文化活動」。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以文化開發人，開發人的大腦。大腦不開發，就會湮滅人性，埋滅靈性。不會做人，不會做事，就是愚昧，就是野蠻，與禽獸何異！而亂開發，錯開發，就會輕則扼殺靈性，重則異化人性。亂做事，錯做人，後果嚴重，不寒而慄！我們的高等教育就是要以高層次的文化，在已開發的基礎上，對人、對大腦作進一步開發，使人性更高、更全面地昇華，使靈性更深、更系統地開啟，使人成為德才兼備的高級人才。反之，若來了個亂開發，錯開發，甚至可以說是惡開發，那麼完全可能培養出人性高度異化（高度缺德，高度劣德），而靈性高度發展（高度富才，高度能幹）的高級「人」才。這樣的人，將會成為遠不如禽獸的社會大害、人類災星，這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與急速發展的今天，尤其值得警惕。人類創造了文化，人類不能用文化來毀滅自己！我們想，這可能正是中國內地與境外所強調的全面素質教育、全面發展教育，以及全人教育、完人教育等等的最基本的出發點，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也正由此發展而來。這是我們所談的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一點。

## 二、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關係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二點，是十分著眼於認識與處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文化）教育與人文（文化）教育的關係。從歷史發展上看，教育有三個階段：人文——科學——科學·人文，現在應該充分重

1 張愛珠、樹君譯，莫洛亞著：《生活的智慧》（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年5月），頁106。

視人文教育了。第一階段，人文階段，即工業革命前的階段，人文文化教育佔了壓倒優勢；第二階段，科學階段，從工業革命開始，科學文化教育逐漸加強，越來越強，直到二十世紀，幾乎完全壓倒了人文文化教育；第三階段，科學·人文階段，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信息革命蓬勃發生了，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了，工業經濟的弊端越來越明顯了，片面強調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嚴重後果也越來越危險了，人文文化、人文教育應當與科學文化、科學教育並重了、結合了。教育就是要育人，首先要教會做人，同時又要教會做事，兩者無法分離，它們既互別互異，又互動互融。如前所述，做事體現做人，做人統帥做事。教會做人，就是講究終極關懷，要使人昇華精神境界，尊重生命，愛護生命，構建和諧，追求幸福，開發生命的潛力，發揮人的偉大創造力，這就是堅定的「為人之本」，這就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教會做事，就是講究實事求是，要使人正確認識世界，全面而協調地按有關客觀規律辦事，這是正確的「立世之基」，這是科學教育的核心。人是文化動物，文化極端重要。生物界靠基因遺傳而存在，靠基因變異而演化。人類社會則靠文化傳承而延續，靠文化創新而發展。文化傳承的主要形式是教育，文化創新的主要基礎當然也是教育。在人類文明進步到今天，文化發展到今天，教育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是現代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教育可以說是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整合。在科技高度發達與急速發展的今天，不論是文化素質教育，還是通識教育，其關鍵就是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交融，其重點就是人文教育的加強，其鋒芒就是直指高等教育中重科學技術而輕人文文化、重做事的能力而輕做人品人的現象。

在內地，華中科技大學是率先對此進行反思的大學之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校將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概括為「五重五輕」和「四個過弱」，即「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書本，

輕實踐；重共性，輕個性；重功利，輕素質」，以及「過弱的文化陶冶，過窄的專業教育，過重的功利導向，過強的共性制約」。針對這一現實，華中科技大學首先開展舉辦人文講座，邀請海內外學者就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等問題作演講，以彌補單一專業教育所形成的知識缺陷。迄今為止，人文講座已舉辦了12年，累計場次達一千二百多場，聽眾達六十萬人次之多。繼人文講座取得成功之後，學校又著手建立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要求理、工、醫類學生選修一定學分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文科學生選修一定學分的自然科學課程。與此同時，學校還積極探索並鼓勵理、工、醫科教師將人文精神滲透到其專業課教學中，文科教師則將科學精神滲透到其專業課教學中。此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投入大量精力，精心建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目前，舉辦人文講座、開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在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成為內地高校促進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相融合的主要途徑。我們也十分欣喜地看到香港同仁在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香港中文大學於2005年6月上旬舉辦的「『人文的科學、科學的人文』學術研討會」就是大好例證。

正如前述，德與才、做人與做事、人性與靈性，均不可分。所謂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分離、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分離之說，正如德與才分離之說一樣，是個「假命題」。本質在於如何去認識這兩者及其關係。在人類文明進步到今天，沒有無科學（或人文）文化的人文（或科學）文化，也沒有無科學（或人文）教育的人文（或科學）教育，正如沒有才（或德）的德（或才）一樣，本質在於是甚麼樣的科學或人文文化，是甚麼樣的科學或人文教育，是甚麼樣的才或德而已。正因為如此，如何去處理兩者的關係，即如何糾正由於認識的誤區與社會的因素而人為地割裂了兩者關係之弊端，倒是一個大的「真問題」。我們對此「假命題」與「真問題」已做過論述。其實，不論是文化素

質教育，還是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的開展，其關鍵就是要認識這一「假命題」，要解決這一「真問題」。

### 三、重視知識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三點，是高度重視知識本身，從而重視有關課程與活動的安排。知識是文化的載體。沒有知識，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人類社會；沒有知識的創新，就沒有文化的創新，就沒有人類社會的進步。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如政治、經濟、軍事等，都是短暫的、臨時的，都會過去，都會成為歷史，都往往沉澱、凝聚為文化，並以知識作為載體而存在。知識創新是一切形式、一切類型、一切層次創新的源頭。當今世界，知識創新越來越多，越來越快，作用越來越重要，影響越來越深遠，對社會進步的支撐與推動越來越密切，以至「知識經濟」初見端倪，「學習型社會」急需建立。學習甚麼？首先學習知識，由此學習文化。沒有學習型社會，就沒有知識經濟；要有知識經濟，就必須建立學習型社會。顯然，沒有科學知識，就沒有科學文化；沒有人文知識，就沒有人文文化。要進行教育，即主要進行文化教育。進行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就必須首先傳授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離開知識、離開作為知識傳授載體的課程與活動而去奢談教育，那只是空話而已。正如前述，受教育者要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或稱為全人，作為前提條件就是知識應該比較全面，既要有科學知識，又要有的人文知識。縱覽歷史，橫觀世界，無論是偉大的文藝家，還是卓越的科學家，還是傑出的領導者，能有幾個例外？中國優良的教育傳統，其第一條就是「博學」，即知識淵博。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講得好，「讀書使人充實」。怎麼充實？「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

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sup>2</sup>顯然，這一切首先是獲得知識，而且要獲得比較全面的知識，重視比較全面的基礎知識，重視相應的課程與活動的安排，並通過學校行政，規定必須獲得相應的學分，這是極為必要的。通識教育關於課程的精心選擇、合理安排、講授的豐富經驗與深刻認識，很值得我們學習。

#### 四、重視知識的內涵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四點，是高度重視知識的內涵。首先是知識作為文化載體所內涵的思維。沒有思維的知識，不能體悟其思維內涵的知識，就是僵死的知識，就是根本缺乏原創能力的死知識，就是載於書本上的知識，就是存於現代電腦存儲裝置中的知識。只有思維，才能激活知識，展開知識，創新知識，超越已有的知識而別開知識的新天地。《尚書》早已明確指出：「人為萬物之靈。」靈在何處？會思維！會推陳出新，會無中生有。恩格斯有一名言：「地球上最美麗的花朵是人類的智慧，是獨立思考著的精神。」<sup>3</sup>獨立思考著的精神，就是會思維。書讀得再多，知識記得再多，但是缺乏思維能力，即不過是個書呆子而已。書可貴，知識可貴，思維能力更可貴。《莊子·天道》中講得何等地好：「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莊子尖銳地批評了世人貴重作為知識載體的書本、語言，而沒有貴重知識所承載的涵意，實質就是沒有去貴重同知識相連的思維。所以，莊子接著舉了

2 王義國譯，弗蘭西斯·培根著：〈史鑒〉、〈詩歌〉，收入《培根論人生》（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1月），頁201。

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組譯，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頁19。



「輪扁斲輪」的寓言，講的就是要十分貴重與用心體悟的「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賴於通過實踐、通過思維去體悟的斲輪規律——「不徐不疾」這一知識的真實內涵。正因為知識如此重要，所以在科學教育時，既要非常重視通過知識進行以邏輯思維為主的科學思維教育，又要十分重視通過知識進行形象、直覺、靈感、頓悟的人文思維教育。科學思維保證思維一定正確，人文思維保證思維可以有原創性。但是，如前所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不可分離。正因為如此，正確的、特別是傑出的科技創造中，一定有人文思維；健康的、特別是卓越的文藝創作中，也一定有科學思維。

## 五、文化教育的實踐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五點，是高度重視文化教育的實踐。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正確的教育理論、認識、方法，都深知文化教育實踐的重要性。孫中山先生為中山大學題有十字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前兩者指學習，中兩者指思考，後者指實踐。這十個字來源於《中庸》，後為白鹿洞書院所襲用。歸納得最明確的，是岳麓書院作為其優秀傳統的四句話：「博於問學，明於睿思，篤於務實，志於成人。」這四句話講得十分清楚，學習、思考、實踐三者緊密結合，方能造就有作為的人才。我們認為，學習是基礎，思考是關鍵，實踐是根本。知識是文化的載體，不首先學習知識，還能談其他甚麼？學習是傳承文化和創新文化的基礎。沒有思考，沒有思維能力，知識就是死的，最多是個書呆子、機器人，思考是獲得文化、掌握文化與創新文化的關鍵。「輪扁斲輪」寓言深刻揭示了，不去親自斲輪，不在斲輪中去學習，去思考，就不能領悟「不徐不疾」這四個字的真諦。王夫之講得對，所謂「躬行為啟化之源」。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對世界有



自身的感悟與認識；也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有創新。創新始於實踐，終於實踐，創新整個過程貫穿了實踐。實踐無止境，認識無止境，創新無止境。當然，在不同領域、不同學科中，在不同條件、不同要求下，實踐的含義與形式也會有不同。所以，在兩種教育中，都強調要組織多種形式的實踐活動，內地大學不但強調多種形式的校園文化活動，還強調多種類型的社會實踐，甚至記以學分。

## 六、相應的教育機構

兩種教育相同的第六點，是在有關的高等學校建立了相應的教育機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通識教育辦公室。在台灣，很多高校亦設有通識教育辦公室或中心。在內地，113所大學分兩批建立了93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之所以如此，就是在科學文化、科學技術急速發展並顯示為似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時，相應的嚴重問題，如社會難於持續發展的問題，已比較充分顯露了，而人們仍迷戀科學文化、科學技術所謂的巨大優勢。這一嚴峻形勢擺在高等學校面前。高等學校何去何從？對此，有識之士已先後高度關注到人文文化、人文教育必須放在足夠重要的地位，人文文化、人文教育同科學文化、科學教育的關係必須正確處理，其落腳之處就是培育甚麼樣的人才，怎麼去培養這樣的人才。因此，境外一批高等學校不僅充分重視這一嚴峻形勢，而且早已有組織地著力開展了通識教育。中國內地也急起直追，一大批高校不僅開展了文化素質教育，而且還建立了相應的基地。

之所以要建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是因為文化素質教育不僅是一種教育思想，也是一種教育實踐。作為一種教育實踐，必須有相應的機構來予以落實和推進。基地在學校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工作。其主要職責是：組織文化素質教育活動，協調院系

和相關部門開展活動，以項目制的方式推進文化素質教育的深入開展。作為文化素質教育制度和機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地在推進文化素質教育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首批建立的基地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湖南大學、重慶大學、吉林大學等校的基地成就突出，通過改革和建設課程、開展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將文化素質教育不斷推向新的發展階段。文化素質教育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進一步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制度建設，建立良好的運行機制，更好地發揮基地的作用，是今後深化文化素質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上述一些機構都是為了更好地推進兩種教育而建立的，它們有著大量共同的感悟、體驗與語言，它們彼此之間已經或正在或擬建立各種聯繫、交流與合作。我們常用「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來形容這種聯繫、交流與合作。

## 七、大學理念與文化素質教育的開展

當然，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並不是完全等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首先，如果說通識教育是美國高等教育在其歷史發展中，將西歐的博雅教育與美國的本土實踐相結合而產生的一種高等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創新的話，那麼，文化素質教育則是植根於中國優秀的傳統教育哲學，基於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實踐，在汲取世界高等教育思想精華同時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

文化素質教育主要繼承了中國教育哲學思想中的兩大精髓：第一，在教育思想方面，高度重視人文教育，重視做人的教育，「在明明德」，「志於成人」；第二，在哲學思想方面，中國哲學中「形上」與「形下」、「本」與「末」、「道」與「器」這些概念之間呈現出一種辯

證的關係。即在高度注重「形上」、「本」、「道」的同時，又不捨棄「形下」、「末」、「器」。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有著重視素質教育的傳統，將素質視為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教育目標。孔子云，「君子不器」，「繪事後素」，以素為先；莊子講，「得意忘言」，「貴者意也」，「授人以漁」；講的都是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的教育哲學思想所講的素質，實質上既有「本質」、「客觀普遍有效性」之意，同時又是不脫離經驗體悟，具有高度個性化的特徵。換句話說，也就是追求對與客觀緊密相聯繫的知識的個性化的理解。概言之，從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角度來解讀文化素質教育，其含義有二：一是「化育」，這不是從外在的角度以政治道德倫理規範去約束人，而是將理想轉化為信念，將信念轉化為情感，情感最終支配人的行為；二是將與客觀緊密聯繫的知識，轉化為一種具有個人性的、經驗性的知識。

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邏輯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現代高等教育是從歐美日移植而來，後又受到前蘇聯的嚴重影響。引進高等教育的直接目的，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因軍事、工業落後而被動挨打的困局。因此，它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的傳授無疑就成為興辦高等學校的主要目的。但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很快就意識到，僅僅重視傳授知識還是不夠的，還必須重視學生能力的培養，要知識與能力並重，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知識經濟初見端倪，人們意識到，高等教育僅僅傳授知識、培養能力是不夠的，現代社會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去創新知識的人才，能運用知識、展開知識、激活知識、超越知識，並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人才。知識創新是一切創新的前提。創新人才的培養，就必須在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基礎上，在厚知識、強能力的基礎上，實施全面素質教育，使之具有高素質。

文化素質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一種本土化的創新。在充分而認真汲取歐洲博雅教育和美國、香港及台灣的通識教育經驗的同時，特別是在汲取課程設置、課堂教學等方面成功經驗的同時，文化素質教育有著自己獨特的品質和特徵。這些品質和特徵表現為：文化素質教育的關鍵，在於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而鋒芒指向強化人文教育，其中重點又在於高度重視民族優秀文化的教育。高等學校的素質教育應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思想道德素質、專業素質、文化素質和身心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是方向，是靈魂；專業素質是主幹；身心素質是保證。作為它們的基礎的、滲透於它們方方面面的，是文化，是文化素質。文化素質是其他三方面素質的基礎，支撐著其他三方面的素質。文化素質教育要滲透在高等教育的全過程之中，不僅要開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或通識教育課程，而且要在理工科類的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教育，在文科類專業課教學中滲透科學精神教育。不僅要開展課堂教學，而且要通過校園文化建設、社會實踐活動來實施素質教育。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而且還要提高教師的文化素質，提高高等學校的文化品位和格調。

如前所述，文化素質教育基礎性地位的確立，是基於對中國內地近五十年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歷史和現狀的反思而提出的。首先，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重政治理論教育而在一定程度上輕做人的基本品質的教育，造成部分學生道德認識與道德行為的不一致。強調文化素質教育，就是要從做人的基本品質入手，務實做人的基本。其次，在專業教育方面，一方面是狹窄的專業劃分，造成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另一方面，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存在著重知識本身的傳授而輕知識內涵的領悟，這嚴重地制約了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文化素質教育致力於使學生的知識結構更為合理，在傳授知識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從而更為注重學生創新意識、能力與精神的

發展。第三，重生理（身體）健康而輕心理健康教育。通過人文精神的培養來鑄造健康的人格，通過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來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都將有利於學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質。顯然，素質教育的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開展，從根本上講，就是應試教育復歸於「文化」的定位。其實，這一復歸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共同的問題。當然，這一復歸是事物發展中高一級的復歸，而非簡單的重複。

總之，「文化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這兩種教育是「和而不同」。近十年來，海峽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界每年都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兩種教育的研討和交流，通過研討和交流，來提升兩種教育的質量。我們欣喜地看到，這種研討、交流、相互借鑒，乃至合作，最終將有利於推進兩種教育，不斷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祖國的統一做出應有的貢獻。

## 參考書目

1. 《尚書》。
2. 《莊子》。
3.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組譯，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4. 張愛珠、樹君譯，莫洛亞著，《生活的智慧》，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年5月。
5. 司馬光，《資治通鑒》。
6. 王義國譯，弗蘭西斯·培根著，〈史鑒〉、〈詩歌〉，收入《培根論人生》，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1月。

